



梁漱溟
著

憶往談舊錄

梁漱溟
著

憶往談舊錄

梁漱溟自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哲学: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613-4222-0

I.人... II.梁... III.①人生哲学—文集 ②社会科学—文集
IV.B821-53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872 号

图书代号:SK9N0214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姚维青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222-0

定 价: 3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代序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

梁漱溟

[无论是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以前,投身乡建运动,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本书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为谋求全国人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而这也是本书上下两编内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为“代序”——编者]

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二段指抗战初起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动。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间,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我生于清季国家多难之秋,早年参加一九一一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欧美宪政于中国,却不料革命后就陷于军阀分裂政权而混战之中,经过一九二七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军阀后依然出现新军阀,混战

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在社会发展史上表见长期淹滞之奇迹，像欧美日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宪政制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详见我所写《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编者注：此文收入全集卷五。）就在行不通的时候，产生出军阀来。瞻望前途，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一条（可看一九二一及一九三〇年我旧著）。然而中国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样统治被统治现形成对抗的两大阶级阵营，有可能一面翻下来一面翻上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故尔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俄国为师，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现新军阀（我写有《我们政治上第二个行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见全集卷五。）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去建设并施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政治上结束军阀分裂之局，树立稳定统一的全国政权。当前问题就在我们怎样能实现这前提条件呢？

要知道军阀是武力缺乏阶级为其主体，落于个人手中，失去其应有的工具性的结果，是家族生活偏胜，阶级没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会，每当其消极相安之局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既然再不能规复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长期分裂内战了。在外国也有不少分裂内战的事例，但对照看来是不同的。他们总是裂痕存在于社会，武力掌握于集团，有时分为两国，有时虽表见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只靠武力为强大阶级所掌握而遂行其统治，掩盖着内在矛盾罢了。我们恰相反，只不过国家政权随个人军权而分裂，矛盾只在军阀之间，初与广大社会无关。不要看欧美日本那些表面统一的国家，其社会是有许多分野、隔阂、对立的，从来为其分裂内战的导源；我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虽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

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缺短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三〇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

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三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一九三八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予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

目 录

代序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

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 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 /2
-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15
- 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21
-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23
- 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节” /33
-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36
-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39
-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42
- 记彭翼仲先生 /49
- 怀黄远庸 /73
- 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 /78
- 纪念蔡元培先生 /81
- 纪念梁任公先生 87
- 回忆李大钊先生 /95
- 略谈胡适之 /99
- 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101
- 忆蒋百里先生 /106
- 怀念卢作孚先生 /115
-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118

- 追忆广州往事 /125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 /136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140
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48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150

下编 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

-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160
访问延安 /166
一九三八年陕甘边区的人口 /178
记一九三九年敌后之行 /179
统一建国同志会 /196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202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210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219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266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 /278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 /282
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284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286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294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305

附 录

- 梁漱溟年谱简编 /309
编后记 /319
增订本后记 /320

往者在鄧平四十初度自為聯語
云吾生有涯願盡中心期填海
力移山今者五十矣此感彌切

上編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梁漱溟

1944

回顧家世與生平并試作檢討^①

讀者從前一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即《我的努力與反省》一文——編者）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於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學者，而相反地我為了中國問題忙碌一生，從不自認是個學者；我自以為革命，卻又實在未能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一起；說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立場吧，又一直在策劃著走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舊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場呢？（附注：可以回答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士人的立場。如所謂“不耻惡衣惡食而耻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如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所謂“志不在溫飽”等便是。）現在且從家世出身、生活環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來檢討看看。

但一個人自己檢討是不夠的，還得要識與不識的朋友們幫助。記得一九五〇年我初到京，便發覺社會風氣有些變好——包含着許多個人的變好。起初我想這是共產黨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黨員一團員）在共產黨領導下不兩年變得與前完全兩樣。他們當初那種大小姐大少爺的氣息和行徑竟不知何處去了，而都自覺自願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

^①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檢討我的立場、觀點和過去一切行事”，並註明為“試作自我檢討之二”，蓋對首次自我檢討文字《我的努力與反省》而言。這兩篇文字均寫於一九五二年。令人遺憾的是此“試作自我檢討之二”於“文革”抄家時被收繳，後雖幸得尋回，但文字後一部分卻丟失而不可復得。因此，作者於一九七六年復閱後有批注：“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後附有該檢討文之寫作提綱草稿，可互相參閱。——編者（後此之注釋，除著者自注註明為“漱注”外，其餘均為編者所加，不再一一表明。）

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一九四二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一九三三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①。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修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

^①《年谱》已收入全集卷一。《我的自学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预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 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讲戏。父亲喜欢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

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当十四岁后二十岁前那时候，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二十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不睡觉。(以上均见《年谱》后我所作《思亲记》。)

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自学小史》里面，所以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①；另一面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约当一八九〇～一九一〇)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书牍和三星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书牍，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子都揽在自己身上来，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

^①著者已于一九七四年将此节补写出，只是较原计划为简略。

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并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

我很早（约十四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诗词文章、汉学考据、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经把中国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里简直是深恶痛绝，但态度温雅，从不肯开口伤人。当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时候，我马上很起劲地跟着他走了。

我常说我一生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来这种错误观念虽得纠正，但依然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我主张重振古人讲学——特别是明儒泰州学派那种讲学——风气，而要把它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意正可见。这或者是从八九岁便参加那些在街头散放传单（例如为美国虐待华工而倡导抵制美货）的种种活动有关系。综观四五十年间，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说改造社会就要下乡，说抗日就要到敌后工作，主张从联合求统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说到行动，一个人在幼小时自难有多大自己主动性可言；但由于父亲启发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之故，养成了我在行动上的自主性。在学业上只读到中学而止，不再升学，就是行动上自主自决的表现。而这一决定又实源于学业上很早便是自学之故。几乎从幼年时起便在学业上是自学，在行动上自主，到后来在自己一生表现则为有志业而无职业的一个。关于有志业而无职业的话容后说，先把自学的话说一说以结束上文（讲我所受的教育）。

当我九岁那年（一九〇二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创办《启蒙画报》出版；这就供给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学资料。如《自学小史》所述“我从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许多各科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先是日刊，随后改旬刊；而同时别创《京话日报》一种。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它用白话文（远比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而不是给所谓“上流社会”看的。内容有新闻，有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约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标题“紧要新闻”，则包涵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时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对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初时风气不开，被称为“洋报”。取价虽廉，而一般人家总不愿增此一种开支。先靠热心人士出钱订阅，沿街张贴，或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慢慢推广。坚持到第三年，而后才发达起来。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的。第五年报纸被封闭，彭先生被发配到新疆，这些事今不及谈。主要说一句：《启蒙画报》出版约满两年，是我十岁内外的好读物；《京话日报》首尾五年，是我十四岁以前的好读物。它们都是非常有生气的。

十四岁入中学后，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课外读物上。换言之，完全以自学为主而不是学习功课作一个普通中学生。我当时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杂志）全年一巨册，以及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籍甚多。再往后（一九一〇年）更有梁任公的《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

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报》(属革命派)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在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财产。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设法得来,十分之九是从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得来。深有自学兴味的我,有了这些资料,便“寝馈其中”;自学之遂成在此。

二

何以说我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呢?通常一个人总要在社会上有一种职业而后能生存;少时求学即所以为后此就业作准备。但自己如何求生存这问题在我脑中却简直像没有出现过。占据我脑中的是两大问题:一个当前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个则是普遍而渊深的人生问题。父亲似乎颇为我虑,但他反对作“自了汉”的思想启发我在先,到我“高谈大睨”起来,拒谈自己谋生之事,父亲亦只好不管了。从革命而作新闻记者;那个新闻记者几乎没有收入的,不是作为一职业在做。随后转入社会主义思想,又转到出世思想,对于个人谋生说乃愈去愈远。倒是在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那三年(一九一三~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想兼学些医术以矫和尚们坐享供养之偏弊。一面读佛典,一面读医书。除了中国旧医书之外,向上海丁福保医学书局购取大批西医书报,研究甚勤。《自学小史》中预拟“学佛又学医”为题而未及写的第十三节正指此^①。不要说后来没有出家亦没有行医,出家了又怎算一项职业呢?

就在不放弃出家之念时,无意中被邀出任一九一六年(倒袁后)南北统一政府的司法部秘书。那时同任秘书的有沈钧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关系;我不是。我一半为帮忙关系^②,一半实迫于家庭负债而出。官吏虽是一种职业了,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为业,又没有担任好久(至次年离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职业。

就在司法部任职之时,蔡元培、陈独秀(文科学长即现在的文学院

^①“学佛又学医”一节已于一九七四年补写完,并已收入《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中。

^②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先生(铭西)邀其任秘书,而张为其舅父,故说为“帮忙关系”。